

評介松田忍《系統農会と近代日本 1900-1943 年》^{*}

末武美佐^{**}

—

松田忍（1976~），為 2008 年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博士，現擔任昭和女子大學人間文化學部歷史文化學科准教授，專攻日本近現代史。主要論文有〈大正 11 年農會法改正と郡制廢止〉¹、〈帝國農會の政治社会史的研究—販売斡旋事業統合から「農会改新案」まで〉²、〈「農家經營改善事業」推進派の成立—1920 年代農政における「經營」問題の浮上の視点から—〉³、〈二・二六事件と農政運動の組織化—帝國農會の変容と關西府県農会連合・大日本農道会〉⁴ 以及大門正克編著《新生活運動と日本の戦後》一書第一章〈新生活運動協會——1940 年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以及指導老師吳文星教授惠賜許多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班研究生

¹ 松田忍，〈大正 11 年農會法改正と郡制廢止〉，《史学雜誌》第 113 卷 10 號，2004 年 10 月，頁 1721-1743。

² 松田忍，〈帝國農會の政治社会史的研究—販売斡旋事業統合から、「農会改新案」まで〉，《史学雜誌》第 115 卷 8 號，2006 年 8 月，頁 1361-1390。

³ 松田忍，〈「農家經營改善事業」推進派の成立—1920 年代農政における「經營」問題の浮上の視点から—〉，《日本歴史》第 669 號，2008 年 4 月，頁 56-72。

⁴ 松田忍，〈二・二六事件と農政運動の組織化—帝國農會の変容と關西府県農会連合・大日本農道会〉，《史学雜誌》第 119 卷 7 號，2010 年 7 月，頁 1241-1264。

代後半から 1960 年代半ば——）、終章〈総括と展望〉等⁵。

松田氏就讀東京大學文學部期間參加近代讀書會即開始注意到日本近代農會之課題。其後，撰寫博士論文時，從農會與政黨或官僚，乃至與地方上展開的各運動之關係去探討農會。本書係 2008 年 7 月 10 日提出的博士論文〈「農業者團體」系統農會與近代日本（1900～1943）〉修訂而成。本書除了緒論、第一章、第五章、結論外，其餘各章已先後發表在《史學雜誌》、《日本歷史》等日本代表性的學術期刊。本書之構成如下：

- 緒論 近代日本系統農會的位置
- 第一章 系統農會之成立
- 第二章 1922 年農會法修訂與郡制廢除
- 第三章 「石黒農政」與農家經營改善指導事業
- 第四章 政黨內閣時期農政運動再編——帝國農會與府縣農會之動態
- 第五章 新農會法之在地接受——以千葉縣山武郡源村為例
- 第六章 「農業經營改善事業」推進派之成立
——由 1920 年代農政「經營問題」出現觀之
- 第七章 向帝國農會之販賣斡旋事業統合
——從販賣斡旋事業統合到「農會革新案」
- 第八章 二二六事件與農政運動之組織化
——帝國農會之變革與關西府縣農會聯合、大日本農道會
- 第九章 因應戰爭時期農業團體之整合
- 結論

關於本書主題「系統農會」之指涉，作者表示可溯至 1870 年代後期以降日本各地民間成立的農談會。因在法制上存在著帝國農會、府縣農會、郡市農會、町村農會，下級農會分別成為上級農會之會員，構成系統的議決機關，故一般總稱為「系統農會」。農會的功能在於使農業者共同擁有生產、流通、販賣等之知識和技術，並具有農政運動團體的性

⁵ 大門正克編著，《新生活運動と日本の戦後》，（東京：日本經濟評論社，2012 年）。

質。作者表示，當我們思考近代日本中央與地方（主要是農村）之關係時，系統農會實居於不容忽視的位置。關於本書問題意識，作者鑑於向來研究者尚未釐清戰前日本農會與政黨制度的關係，於是以政治史的視角切入，爬梳新史料以究明農會與政黨之間長期的互動關係及其變化，闡明農會在近代日本政治史之角色和意義。

本書作者之所以能分析連接國家與農業生產者之線路究竟是以什麼目的、什麼組織而形成，在於農會關係史料狀況顯著的改善。1990 年代以降因松山大學圖書館川東埤弘之盡力，原帝國農會幹事岡田溫（1870-1949）及其子岡田慎吾個人史料以「岡田文庫 農政關係資料」、「岡田慎吾農政關係資料」被公開。「岡田文庫」係以第一次（1992）、第二次（1993）所接受的刊行資料為主，第三次（2003）所接受的資料包含帝國農會內部資料、統計基礎資料、岡田溫日記（1892-1949）、便箋、信函等史料一萬數千件。上述史料十分珍貴，自不待言。作者主要根據這些史料，並充分加以活用。

第一至第九章以政治史之脈絡論述農會之設立以迄廢除。作者表示透過此一考察將達成以下兩大目標：其一、呈現戰前政黨政治成立之同時，究明系統農會法制化及其強化，扮演輔助政黨制度之角色。其二、究明擁有農業專門技術者之動向在近代日本政治史之位置。結論進而申論近代日本系統農會之意義。茲介紹本書內容要旨如下。

二

第一章探討農會法制定之過程。1899 年制定農會法⁶，翌年 4 月 1 日起農會正式依據法制度而運作。農會法案於 1891 年向國會第 2 議會提出。其目的在於追認當時郡以下的行政單位所成立的農會，將之置於府縣和郡的管理下。最後，通過的農會法所規定的農會，已不是上述「農談會」之組織。系統農會設立之初，其本質乃是一元化管理和普及農業技術及

⁶ 為何農會法制化始於 1899 年？作者認為背景有三：其一，為了獲得貨幣或防止貨幣流失，很需要農產品的增產，因而產生技術指導團體之需求；其二，近世以來老農傳承的農法經過科學性考證之結果，此時正好確定哪些是該留下的；其三，從事農業者本身熱心追求農業新知識及改革農業技術。松田忍，《系統農會と近代日本 1900-1943 年》，頁 19-20。

資訊。重要的，在於開始形成連結中央與個別農業經營者之管道。至於系統性組織之規定，則訂入 1900 年發布的農會令中。成為其後半世紀日本農會之特質。

第二章探討因廢除郡制而制定的 1922 年「新」農會法之意義。作者指出政友會在郡制廢除之際即提出將郡的必要事業由農會繼承之方針，亦即是已意識到農會法之修訂。另一方面，對實際推動農業獎勵的農商務省而言，郡制廢除乃是一大問題，因此，農商務省所採之方針為一面透過農會法之修訂，認可會費強制徵收⁷；一面透過町村農會「總代權」之引進，承認其為公法人，謀求強化農會之公性格，給予農會作為郡單位的農事獎勵之實行團體的地位。

第三章作者重新探究 1920 年代以迄 30 年代之所謂「石黑農政」⁸，論述對石黑忠篤為中心的農商務省官僚而言，「新」農會法是否係具體規定系統農會應負責什麼事業之法律。「新」農會法實施之後農會之事業目的改為「農業指導」。就具體的事業重點觀之，1900 年代可以改善「生產」，1910 年代可以改善「流通」，但作為 1920 年代特色的關鍵詞毫無疑問為「經營」。這是本乎最重要的在於指導農業經營和農家生活之想法。其技術的特質乃是從向來的稻米增產求變、重視農家經營的均衡之技術體系。其背景為即使國家介入個別農家的經營技術有所困難，仍決定為之。石黑農政最重要的項目為農家經營改善事業，設想以系統農會負責該事業，趁著廢除郡制、郡役所之機推動農事指導事業一元化。

第四章首先指出以中川滋治、大石齋治、內藤友明等農業經營者為中心在全國各府縣設立「農會之別動隊」，以有志之士的政治運動之樣貌呈現推動農政運動之農政俱樂部的活動，尤其是將其組織化之過程。

⁷ 農會法修訂前，政府給予農會的補助金甚少，而農民「自動繳交的」會費則大多未繳納，以致農會陷入嚴重的經費不足。因此，對農會關係者而言，取得會費強制徵收權，使農會的活動興盛，乃是修法的首要目的。另一方面，農商務省農務局雖承認農會存在的意義，但對授予農會會費的「強制徵收」之權限則感到為難。蓋恐怕農會誤用公法之權限，反而傷害「農家的利益」。結果，農會法修訂案雖認可會費的強制徵收，但附加關於會費之運用須由農商務省指導之條件，以期獲得貴族院通過，松田忍，《系統農會と近代日本 1900-1943 年》第二章。

⁸ 關於「石黑農政」之樣貌，作者補強向來的研究並加以說明。引用庄司俊作之看法說明「石黑農政」之核心，指出其專長在於租佃問題對策，以及農村經濟更生運動，松田忍，《系統農會と近代日本 1900-1943 年》，頁 91。

其次，充分利用「岡田溫日記」，釐清 1920 年代農會的農政運動之實際情況。指出米投賣防止運動⁹後系統農會的會議配合帝國議會會期召開，而與政黨的動向和步調相一致，並常態化；在此一被認為人事上「農會政黨化」時期，帝國農會會長改選過程並沒有私下先講好的痕跡；農會雖慎重地與各政黨保持距離，但仍可略窺其與執政黨的政友會之關係。

第五章以千葉縣山武郡源村為例，論述地方社會如何利用「新」農會法下的農會。源村缺乏資源，但以村民齊心協力達成地方改良，曾於 1903 年被內務省評定為日本三大「模範村」。然而，1910 年前後，由於各種選舉的預選方式等原因，該村的秩序漸漸地瓦解。推動源村自治的「睦會」成員為了調整村民的利害以恢復秩序，乃透過「新」農會法下的系統農會，致力於尋求必要的新「公正性」。

以上述地域社會訴諸於村農會為背景，作者指出，根據 1923 年 1 月 1 日實施的「新」農會法，市町村農會乃是以轄區內從事農業者為會員，地主和佃農是處於平等的地位；並以總會作為議決機關。因此，擁有 100 名會員的市町村農會，可以透過普通選舉選出代表組成總代會。

第六章討論 1920 系統農會最高組織帝國農會對農會之運用有什麼樣的構想？提到在該會規劃農會運用的兩個重要人物：東京帝國大學農科大學教授那須皓及帝國農會幹事岡田溫¹⁰。雖然他們兩人原本對以地主佃農問題為中心的階級問題之看法不同，不過後來看法一致，主張負責農業經營指導的農會不適合處理地主佃農問題。

⁹ 米投賣防止運動是系統農會最早公然推動的農政運動。1920 年春以降，因恐慌而導致一般物價下跌，主要的農產品尤其是米、蠶繭價格暴跌。不過，肥料、生活物資等加工品則相對的維持高價，農民陷入苦境。為了因應此一情況，最初由府縣農會主導展開的地方性運動，變成由帝國農會主導而動員基層農會的全國性運動。由於農會組織不統一且欠完備，導致運動的結果歸於失敗。詳閱農業發展史調查會，《日本農業發展史》第 7 卷（東京：中央公論社，1955 年），頁 237-238；栗原百壽，《栗原百壽著作集第 5 卷 農業團體論》（東京：校倉書房，1979 年），頁 192-208；玉慎之介，〈系統農會による米投売防止運動の歴史的性格——岡山県の分析を中心に〉，收於《岡山大學產業經營研究會研究報告書》第 23 集（1988 年 5 月），頁 1-30。

¹⁰ 那須皓係 1920 年代代表的農政學者，以石黑忠篤的智囊而活躍，同時，以勞工的顧問出席第三屆 ILO（國際勞工組織）總會，並以帝國農會顧問對農會運用問題提出許多建議。岡田溫係帝國農會幹事，以農業技術者身分在農業指導現場將「石黑農政」之理念付諸實現，占有不可或缺之地位。松田忍，《系統農會と近代日本 1900-1943 年》，頁 220，兩人之事蹟和經歷詳見該書頁 236。

1921年，兩人對於階級問題提出不同的意見。¹¹ 其後，1926年那須氏建議著手系統農會農家經營改善事業。其撰文表示因地主並非農業者，故應從作為農業者團體的系統農會中加以排除，修訂農會法，使農會純然以農業經營者組成，會費亦僅向農業經營者徵收。必要時，分別成立佃農、地主團體，相互對立也沒關係。亦即是，將農家經營問題與階級問題切割，解除系統農會的階級問題。當時，針對那須氏的建議，岡田氏亦提出看法，認為系統農會之目的在於增進農業經營者之福利，儘管農會的會員應以農家經營者為對象，但從農業改良的「間接受益者」而言，也可以容許地主為會員。另一方面，則反對農會介入地主佃農問題。蓋因若農會會員發生利害衝突，農會全體將成為爭議的當事者而陷入機能不全。岡田氏為避免農會捲入爭議、尋求農業者之利益（即農業經營改善），乃在乎農會本身的機能。作者指出，其變化為兩個人對於系統農會展開之農業經營改善事業有很大的期待，因此各自開始將經營指導和階級問題分開思考的結果。

第七章探討系統農會作為直接指導農家的團體之理念如何落實。向來各府縣農會聯合經營的販賣斡旋事業，於1929年依農林省農務局之意向在帝國農會主導下統合作為契機，農家經營改善指導（「生產合理化」）和販賣斡旋事業（「流通合理化」）一起被考量。然而，其後在因應蠶絲業組合法中鞏固優先安定農家經營的帝國農會之立場。¹² 帝國農會幹部為了實現本身的構想，不得不考慮強化和改革系統農會組織。正因為如此，1931年3月31日第59議會結束後，帝國農會幹事岡田溫隨即開始草擬改造農會之案，其後，提出「農會改新案」，獲得幹事們之支持。此一「農會改新案」從與事業相關聯說明了「新」農會法制定之

¹¹ 1921年第三屆ILO總會討論租佃組合權之際，岡田氏抱持與日本政府相同的看法，認為佃農並非農業勞動者，日本政府沒有認可租佃組合權之義務。相反的，那須氏則在會議上主張政府有權認可租佃組合權。作者指出當時兩人對地主佃農關係為中心的階級問題之理解不同。詳見松田忍，《系統農會と近代日本 1900-1943年》，頁220-221。

¹² 1931年，政府為了農業的長久安定，向第59議會提出蠶絲業組合法案。像這樣制定法律對帝國農會幹部產生大衝擊。他們視為問題者乃是農會的「販賣統制」=「生產統制」的「統制」與蠶絲業者的「統制」迥然有別，而且蠶絲業者之「統制」原理引進農村將產生混亂。他們認為安定農家經營最為重要，養蠶業不過是農家經營的一部門，其統制並非為了養蠶業之發達，而是為了農家經營之安定，松田忍，《系統農會と近代日本 1900-1943年》，頁253-259。

後為何系統農會必須以幾乎網羅所有農民和町村之形態而成立。顯示該案設想以郡農會作為農會指導事業的基本團體，在郡與町村以下的農會之間進行「販賣統制」和生產指導，係為了一元化指導販賣和生產的組織改革構想。

第八章作者論析二·二六事件後系統農會性質之變化及內部制度之變革。1930 年代以降帝國農會對農政運動之立場產生劃時代的變化，其中心為關西府縣農會。¹³ 1936 年在第 69 議會中，帝國議會展開史無前例的活動。此次議會重要的目的在於米穀自治管理法、蠶繭處理統制法、重要肥料業統制法三法案之制定，¹⁴ 這些都是有關改善農業經營之重要法案。三法案制定後，岡田溫開始推動實現帝國農會部制改革計畫。二·二六事件後，關西府縣農會與向來首重農家經營改善事業帝國農會之關係產生顯著的變化，當各政治勢力向議會集結的洪流中，帝國農會接受關西府縣農會之要求而全面投入政治運動。以「農政部」之設置為代表的制度變革中，在人事上引導 1920 年代以來的農家經營改善事業、販賣斡旋事業路線的岡田溫等老幹部也被淘汰了。

第九章探討帝國農會配合戰爭重編到最後廢除的情形。戰爭期間於 1940 年第 75 議會進行關於農會法的大修訂。¹⁵ 戰爭期間為了因應增產的要求，系統農會進行重編一事，顯著化與負責農產品供給、農業資材配給的產業組合系統之競合關係。其意義似乎是廢除郡制 / 郡役所以降居於農林省獨自指導網之位置的系統農會被廢除，農業團體再被置於內務行政的影響下。另一方面，不容忽視的，此一時期農業團體本身的機能亦產生質變。作者指出當時系統農會事業骨幹的經營改善之方向性被否

¹³ 以關西府縣農會為母體的產業技術者謀求政治性結集，成立政治團體大日本農道會。該會維持與右翼勢力之關係的同時，尤其是增加以系統農會技術者為中心的會員，進而向帝國農會要求對農業者政治的、精神的組織化。不過，二·二六事件前帝國農會和部分的農會技術者與關西府縣農會連合、大日本農道會仍保持距離，持續主張繼續從事 1920 年代以來系統農會對農業者所積極致力的經濟指導，松田忍，《系統農會と近代日本 1900-1943 年》，頁 279-292。

¹⁴ 各法案分別與防止米價低落、實現蠶繭的「公正」價格、降低肥料價格有關。

¹⁵ 當時提出的修訂案之要點如下：將農會該做的事業置於「農業之指導獎勵及統制」、行政長官必要時得對農會發布關於統制相關設施之命令、行政長官得下令市町村農會會員服從「統制」、將市町村內存在的各種農事實行組合加入市町村農會等，松田忍，《系統農會と近代日本 1900-1943 年》，頁 313-314。

定，規定農業應根據國家的要求而經營，農業團體之角色變成本乎對農業者團體（向一定方向）之統制而傳播農業技術，1920 年代以來系統農會所構築的技術員網絡不再被認為有用。雖然還有關於農業團體內涵意義之攻防，以及關於內務行政與農業團體之分掌等問題，但農業團體法仍獲通過，自 1943 年 9 月 15 日起實施。27 日，中央農業會設立總會，以酒井忠正為會長、小池權一位副會長；30 日，解散帝國農會。

結論總結全書內容之後，進而考察近代日本系統農會的意義。作者指出，戰前日本，地主、自耕農、自耕佃農、佃農等許多小規模直接生產者普遍獨立存在著，造成不穩定的狀態，不可避免的，乃提出以他們為對象的政策，進行對他們之指導。作者指出在此一狀況下系統農會始終存在直接對農民產生影響力的管道。系統農會本身亦具有成為代表農業利益的政治團體之一面。帝國農會認為，優先推動經營指導下仍留下的法制上問題透過政黨、農商務省（農林省）、帝國農會三者協議以謀求解決。此一看法乃是以政黨政治之成立為背景。亦即是，透過政黨政治與系統農會結成互補關係帶來日本國內安定之構圖。

三

本書自 2012 年出版以來已經過四年，在日本國內已有幾篇書評，筆者參考這些書評的意見，並提出個人的看法和展望。伊藤淳史明確地指出本書之特色，亦即是「利用岡田溫史料等一手資料，詳細分析系統農會之動向」。¹⁶ 本書作者也表示，系統農會史研究在日本近現代史研究中，無論是政治史、經濟史領域，或是社會史、運動史領域均具有值得進入且景緻甚佳的位置，然而，向來受限於資料，使得投入研究者始終難以突破，直至找到岡田溫資料才出現契機。¹⁷ 松田氏以自大學時代以來長期接受近代日本政治史實證研究方法之訓練，小心地解讀和闡釋一手資料，利用專業知識進行挖掘史實的工作，適當地處理特殊資料，而產生有特

¹⁶ 伊藤淳史，〈書評 松田忍著『系統農會と近代日本 1900-1943 年』〉，收於《史林》96:2（2013.3），頁 124。

¹⁷ 松田忍，《系統農會と近代日本 1900-1943 年》，頁 355。

色的研究。

例如本書第七章進行系統農會的上層機構帝國農會的內部分析，其中，第三節 1931 年岡田溫所提出的「農會革新案」首次被究明。之所以有此新發現，的確得力於上述岡田溫資料。¹⁸ 松田氏利用岡田溫資料時，該資料仍處於未整理、未刊行之狀態，¹⁹ 閱讀龐雜的資料內容，以及理解資料之背景和意義，實在不容易。又如第八章松田氏仔細利用資料中之書信，重建並檢討二·二六事件導致系統農會性質之變化過程中帝國農會內部複雜的人際關係之動向，客觀地全面探討從公的見解到私的動態，徹底貫徹實證主義。像這樣，作者利用特殊資料，進行客觀且忠實的實證研究，率先完成系統農會內部之考察，乃是本書最大的特色。

松田氏以政治史的視角切入，充分利用岡田資料，究明政治與系統農會之關係，同時關注中央政治與系統農會的上層機構，以及地方政治與郡農會、町村農會等系統農會的下層機構之關係。例如第五章探討 1922 年農會法改正後農會在地方上角色之變化，呈現農會法改正的目的、「新」農會法的理念與接受實況之不同。其關照面十分周延，且做了細緻且平衡的探討。無怪乎，野本京子的書評形容本書為「勞作（精心著作）」²⁰。

如上可知，本書努力貫徹其問題意識，戰前系統農會與政黨制度的關係，對系統農會史研究有突破性的貢獻。正如野本京子、伊藤淳史兩人所指出的，本書究明農會與政黨政治、地方行政之關係，指出系統農會扮演輔助政黨政治之角色。²¹

至於本書尚有一些不逮或可進一步探討之處如下：首先，關於作者在緒論和結論中提及本書的關鍵詞為「經營」、「生活」，野本京子、伊藤淳史兩人均指出，關於「經營」雖在本文中已有觸及，但可惜的關

¹⁸ 松田忍，《系統農會と近代日本 1900-1943 年》，頁 242。

¹⁹ 參閱松田忍，《系統農會と近代日本 1900-1943 年》第七章註釋 3。

²⁰ 野本京子，〈書評と紹介 松田忍著『系統農會と近代日本 1900-1943 年』〉，收於《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雜誌》661（2013.11），頁 79。

²¹ 野本京子，〈書評と紹介 松田忍著『系統農會と近代日本 1900-1943 年』〉，頁 79、伊藤淳史，〈書評 松田忍著『系統農會と近代日本 1900-1943 年』〉，頁 124。

於「生活」與系統農會之關係則未有討論。²²並指出有些固有名詞、年代、重要人名等明顯的有錯誤。²³以上缺失可能是作者單純的疏失，但因而造成讀者有所誤解，實有必要於再版時改正。

其次，第三章論述東京帝國大學農科大學農學科實科畢業生之動向，佐藤正志的書評認為是本書重要的成果之一。²⁴本書的目的之一為究明「農業技術者的動向在近代政治史的位置」，因此，作者以一節的篇幅論述他們究竟具有什麼背景。筆者認為如此處理可說相當適切。

作者指出設置不久的「國內最高技術者培育設施」²⁵之農學科實科畢業生均勻地分布在日本國內及殖民地朝鮮的中央各省廳、系統農會、農事試驗場、農學校等機關。近年來關於農業研究者、技術者的背景及其動態之研究，已指出「札幌農學校」（含其後之東北帝國大學、北海道帝國大學）出身者特別活躍於殖民地。²⁶因此，若就殖民地觀之，作為「國內最高技術者培育設施」的東京帝國大學農科大學農學科實科畢業生之表現，實有再探討之餘地。目前不少先行研究顯示東京帝大、「札幌農學校」出身的農業研究者、技術者分別在朝鮮、臺灣和滿洲（中國東北）等殖民地的農業部門十分活躍，形成「學閥」，推動臺灣、朝鮮、滿洲等地的農業現代化。

儘管松田氏根據農學科實科的同窗會「講農會」所編的《講農會會則及會員名簿》，整理出1924年11月畢業生在日本中央省廳及47府縣、朝鮮13道之農業部門、農會、農業試驗機關、農學校任職概況，指出東

²² 野本京子，〈書評と紹介 松田忍著『系統農會と近代日本 1900-1943年』〉，頁81-82，伊藤淳史，〈書評 松田忍著『系統農會と近代日本 1900-1943年』〉，頁124。

²³ 野本京子，〈書評と紹介 松田忍著『系統農會と近代日本 1900-1943年』〉，頁83，伊藤淳史，〈書評 松田忍著『系統農會と近代日本 1900-1943年』〉，頁126-127。

²⁴ 佐藤正志，〈書評と紹介 松田忍著『系統農會と近代日本 1900~1943年』〉，收於《日本歷史》（787），頁123。

²⁵ 松田忍，〈系統農會と近代日本 1900-1943年〉，頁96。

²⁶ 參閱吳文星，〈札幌農學校と台湾近代農学の展開——台湾總督府農事試験場を中心として〉，收於台灣史研究部會編，《日本統治下台湾の支配と展開》（名古屋：中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2004年）；井上勝生〈札幌農學校と植民学の誕生〉，收於《帝國日本の学知 第1卷》（第一章）（東京：岩波書店，2006年）；田中耕司・今田良一，〈植民地経営と農業技術——台湾・南方・満州〉，收於《帝國日本の学知 第7卷》（第三章）（東京：岩波書店，2006年）等。

京帝國大學農科大學農學科出身者分布在日本國內和朝鮮²⁷。然而，限於本書的主題，並未進一步說明在朝鮮的畢業生所屬機關和職務，也未說明為何無人任職朝鮮農會，亦即未進一步分析在朝鮮的畢業生之實況。事實上，以上是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

本書究竟與日治時期臺灣農會研究有何關係？本書作者以政治史的視角切入，究明戰前日本農會在近代日本政治史之角色和意義。反觀日治時期臺灣的農會，日治之初，臺灣總督府引進近代農會，各地陸續出現農會。1908年總督府首先頒布「臺灣農會規則」、「臺灣農會規則施行細則」，臺灣農會開始邁入法制化。翌（1909）年各廳農會改組為法人團體，全臺設12個廳農會，強制農民入會成為會員。1920年隨著地方行政區劃調整，實施州廳街庄制度，全臺農會改為5個州農會及3個廳農會。農會組織一直為單級制，會長由州廳首長兼任，州廳以下無農會組織，郡市設支會，街庄設地方委員。1937年總督府頒布「臺灣農會令」，建立臺灣農會和州廳農會的二級農會組織制度，會務完全由政府官員及其認可的民間代表推動，農民雖是會員，卻無權過問會務。1943年12月，總督府，配合經濟統制政策，頒布「臺灣農業會令」，建立一元化的農業會。將產業組合、畜產會、青菜同業組合、米穀納入組合、肥料配給組合、農機具製造會社等全部併入農會系統。市街庄的信用、販賣、購買、利用組合與其他農業、米穀、肥料、青果、畜產、山林、農機具等產業組合合併，改成市街庄農業會，建立臺灣農業會、州廳農業會、市街庄農業會的三級組織體制。

由上可知，臺灣的農會乃是日治時期長期存在的組織，其創立和演變始終與總督府有著密切的關係，因此，將臺灣的農會置於統治政策史中進行探討可說頗為適切。透過此一視角對農會規則制定的過程、人事結構、事業實況等進行長期的觀察，相信可以適切究明臺灣的農會係以何人為中心、農會在總督府和臺灣社會之間的角色為何，以及農會如何配合殖民統治政策推廣臺灣近代農業等課題。

綜括而言，本書可說不僅是開啟近代日本系統農會研究新天地的佳作，並帶給日治時期臺灣農會研究不少啟示和參考。用是，特加以評介，供臺灣研究界參考。

²⁷ 可參考松田忍，《系統農會と近代日本 1900-1943 年》，頁 96-103。

徵引書目

1. 大門正克編著，《新生活運動と日本の戦後》。東京：日本經濟評論社，2012年。
2. 井上勝生〈札幌農学校と植民学の誕生〉，收於《帝國日本の学知 第1卷》（第一章）。東京：岩波書店，2006年。
3. 玉慎之介，〈系統農会による米投売防止運動の歴史的な性格 -- 岡山県の分析を中心に〉，收於《岡山大學産業經營研究會研究報告書》，第23集（1988年5月），頁1-30。
4. 田中耕司・今田良一，〈植民地經營と農業技術—台湾・南方・滿州〉，收於《帝國日本の学知 第7卷》（第三章）。東京：岩波書店，2006年。
5. 伊藤淳史，〈書評：松田忍著『系統農會と近代日本 1900-1943年』〉，收於《史林》，96：2（2013.3）。
6. 佐藤正志，〈書評と紹介：松田忍著『系統農會と近代日本 1900-1943年』〉，收於《日本歴史》，787。
7. 松田忍，〈大正11年農会法改正と郡制廃止〉，《史学雜誌》，第113卷10號（2004年10月），頁1721-1743。
8. 松田忍，〈帝國農会の政治社会史的研究—販売斡旋事業統合から、「農会改新案」まで〉，《史学雜誌》，第115卷8號（2006年8月），頁1361-1390。
9. 松田忍，〈「農家經營改善事業」推進派の成立—1920年代農政における「經營」問題の浮上の視点から—〉，《日本歴史》，第669號（2008年4月），頁56-72。
10. 松田忍，〈二・二六事件と農政運動の組織化—帝國農會の変容と関西府県農会連合・大日本農道会〉，《史学雜誌》，第119卷7號（2010年7月），頁1241-1264。
11. 松田忍，《系統農會と近代日本 1900-1943年》。東京：勁草書房，2012年。
12. 吳文星，〈札幌農学校と台湾近代農学の展開——台湾總督府農事試驗場を中心として〉，收於台湾史研究部會編，《日本統治

- 下台湾の支配と展開》。名古屋：中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2004 年。
13. 栗原百壽，《栗原百壽著作集第 5 卷 農業團體論》。東京：校倉書房，1979 年。
 14. 野本京子，〈書評と紹介：松田忍著『系統農會と近代日本 1900~1943 年』〉，收於《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雜誌》，661（2013.11）。
 15. 農業發展史調査會，《日本農業發展史》第 7 卷。東京：中央公論社，1955 年。

